

#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大事要览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所史编撰委员会 编

科学出版社

北京

##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以确凿的史料为基础,记述了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建所 78 年(1928~2005)的历史沿革,并按年代顺序对历年发生的比较重要的大事做摘要式叙述。通过纵览全书,得以了解该所的发展轮廓和史实梗概。它是一本了解该所发展史的入门书,也是研究当代中国生物科学、动物学、昆虫学发展史的参考书,是一本可备查考的工具书。

本书可供科学技术史、科学技术政策研究人员和生物科学工作者参考。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大事要览/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史编撰委员会编.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ISBN 978-7-03-019387-2

I. 中… II. 中… III.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大事记-1915~2005  
IV. Q95-2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07074 号

---

责任编辑:曾建飞 霍春雁/责任校对:鲁素

责任印制:钱玉芬/封面设计:王浩

**科 学 出 版 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7 年 8 月第 一 版 开本:787×1092 1/16

2007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25 1/4

印数:1—2 200 字数:578 000

**定价:9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环伟〉)

# 编委会名单

主任 王祖望

编委 (按姓氏笔画顺序排序)

王林瑶 王祖望 伍一军 庄临之 邹继超

陈永林 孟祥玲 赵建铭 商秀清 翟启慧

秘书 商秀清

# 序 言

以史为鉴，可知兴衰。为了再现动物研究所近 80 年的辉煌历史，汲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挖掘和弘扬老一辈科学家的优良传统和创新精神财富，增强全所人员的自豪感和凝聚力，激励新一代动物研究所人不断进取、开拓创新，2003 年，动物研究所领导班子决定启动动物研究所所史（以下简称《所史》）<sup>1)</sup>编写工作。随之成立了以王祖望研究员为组长的《所史》编撰课题组，成员大部分是离退休的老同志。他们在动物研究所工作了数十年，亲身经历了动物研究所的发展和壮大，对动物研究所有无比深厚的感情。编撰课题组成员怀着高度的责任感，为确保史实资料的准确性，不辞辛劳，广泛调研，查阅历史档案，认真核对，反复讨论，为本书高质量地完成做出了卓越贡献，也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如编撰组成员孟祥玲先生临终前在发音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还向所领导和编撰组组长交代哪里应该还有一些史料，哪里可能还有一些照片，叮嘱“一定要把所史写成精品”。赵建铭先生、陈永林先生都是在身体不是很好的情况下坚持工作，直到住院还惦记着所史编撰工作。动物研究所新老职工以及曾经在动物研究所工作过的干部和科技人员对本书的编写也十分支持。经过三年的艰苦工作，近 60 万字的《所史》终于出版面世了。在此，我们代表全体动物研究所人向《所史》编撰课题组的全体成员，向为《所史》提供珍贵资料、图片的同志们，向为《所史》编撰提供帮助和服务的有关档案馆、图书馆和动物研究所相关职能部门的同志们，以及科学出版社的编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本书的出版是动物研究所的一件大事，也是动物研究所创新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成果。它必将对动物研究所今后的发展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从这本反映近 80 年动物研究所历史的书籍中，可以窥见我国动物学的发展轨迹，同时其对于研究我国生物学的发展历史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历史悠久，功勋卓著。其前身是 1928 年成立的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及 1929 年成立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和国立北平研究院动物学研究所。动物研究所产生的 12 位中国科学院院士，是我国生物学及其分支学科（如动物学、生态学、生殖生物学、鸟类学、兽类学、昆虫学、分类学、动物遗传学、昆虫生理学等）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董志先生是我国最早生物研究机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及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的主要创建人，也是我国动物学会的创始人，是我国近代生物学及动物学的主要奠基人。动物研究所曾在反细菌战、飞蝗治理、鼠疫防控、朱鹮再发现、保护区设立、熊猫保护、细胞核移植及生殖避孕等研究方面做出过重大历史贡献。

动物研究所近 80 年的发展历史是极其不平凡的，其间经历了无数坎坷和挫折。但动物研究所的先辈们百折不挠，怀着一颗颗赤子之心，排除艰难险阻，坚持科学救国的

---

1) 动物研究所所史包括一系列出版物，目前拟先期出版《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简史》和《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大事要览（1915—2005）》两本。

真理，为我国的动物学事业的延续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先辈们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还积累和总结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例如，秉志先生认为对待研究工作必须具备“五心”——决心、信心、恒心、耐心、细心；还必须要有“三不怕”精神——不怕困难、不怕麻烦、不怕失败；并且强调科学家的治学精神为“公、忠、信、勤、久”五字。先辈们还提倡做科学研究要坚持“三老四严”，即说老实话、做老实人、办老实事；严肃、严密、严格、严谨。先辈们这种热爱祖国、献身科学的崇高精神，治学严谨、锲而不舍的工作作风，以及待人诚恳、为人师表的优秀品德，永远值得我们后人敬仰和学习。

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创业、辛勤耕耘和不辍努力，动物研究所已成为我国动物学的研究创新基地、高级人才培养基地和科学普及基地，成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农业可持续发展、人类生殖与健康领域的重大战略科技支撑。特别是自 2001 年整体进入中国科学院二期知识创新工程试点以来，动物研究所在科技目标凝练、科研结构调整、体制改革、机制转换、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显著提升了科技创新能力。短短几年，动物研究所各项科技指标迅速攀升，如荣获 6 项国家奖、发表数篇国际顶尖论文，发表 SCI 论文数和引用及研究生和博士后培养质量排名均跃居全国科研机构前列等。动物研究所在珍稀濒危动物保护、农业虫害和鼠害综合治理、动物疫病和外来物种预警与防控、动物克隆与生殖发育研究等方面为国家科技领域做出了重大的创新贡献，实现了动物研究所历史上的再度辉煌。

进入 21 世纪，动物研究所根据当前国内外科学发展态势和国家战略需求，提出了未来 5~15 年的发展规划和目标：面向国家战略需求，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实现科技创新能力的跨越和持续发展，将动物研究所建成国家动物学基础研究创新基地、高新技术研发基地、高级人才培养基地、科学知识传播基地；力争在 2010 年前，在动物学领域取得一批原创性的重大科技成果，综合科技创新能力达到本领域国际先进水平；在国民经济发展、生态安全和人类健康领域，获得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和重大成果；力争在 2020 年前，进入动物学研究领域中国际著名研究所行列，实现“一流成果、一流效益、一流管理、一流人才”战略目标。从发展态势来看，通过三期创新，动物研究所是有能力、有信心实现“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迈向国际一流水平”这一宏伟战略目标的。《所史》的出版必将激励和鞭策动物研究所的科技人员，抓住创新三期和搬迁新园区的发展机遇，秉承“实行全面开放，争创国际一流”的办所理念，树立创新为民的科技价值观，树立自主创新意识和赶超国际一流信心，开拓创新、锐意进取，大幅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用实际行动来书写动物研究所更加美好的未来！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所长

党委书记

2006 年 12 月 20 日

# 前 言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是我国建立最早的动物学研究机构。她是 1962 年由原动物研究所和昆虫研究所合并而成。昆虫研究所的前身是中国科学院 1950 年 8 月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昆虫学组和国立北平研究院动物学研究所昆虫研究室的基础上组建成立的昆虫研究室，1953 年昆虫研究室发展成昆虫研究所。原动物研究所的前身则是中国科学院于 1950 年 10 月，在接管国立北平研究院动物学研究所和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动物部保藏的大量动物标本而成立的动物标本整理委员会，1951 年 5 月动物标本整理委员会更名为动物标本工作委员会，并于 1953 年扩建成动物研究室，1957 年又发展成动物研究所。1962 年昆虫研究所和动物研究所合并，成为现今的动物研究所。因此，动物研究所的历史要追溯到 1928 年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成立之时。

自 1928 年至今，动物研究所历经风雨沧桑，走过了 78 年不平凡的历程。半个多世纪的辉煌，凝结了几代动物学家顽强拼搏、励精图治、勤于攀登的足迹，为我国动物学和动物研究所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创造了辉煌的业绩。

从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建立至新中国成立的这 20 多年时间里，老一辈科学家在连续不断的战乱年代圆满地完成了创建研究机构、培养人才、开展科学研究的奠基事业，造就了他们的科学业绩，培养出一大批动物学研究的英才，做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新中国成立以来，动物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在不同历史阶段，在参加国家重大经济建设和完成科研任务中表现出相当雄厚的实力。在反细菌战、细胞核移植、生殖生物学和蝗虫、黏虫、棉花害虫以及鼠害等有害动物综合防治，朱鹮、白鹤、遗鸥、大熊猫等濒危物种保护，《中国动物志》的编研以及在动物科学基本资料调查和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大批重要的科研成果，为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和国民经济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21 世纪以来，动物研究所在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的推动下，综合科技竞争力不断攀升，在动物克隆、外来物种预警、动物疫病防控、生态与环境保护和人类健康等诸多研究领域展示出深厚的研究实力。通过凝练科技目标、优化学科布局、聚集优秀人才、活跃学术气氛、深化体制改革、改善科研条件与环境等，使得动物研究所的科技创新能力已经位居全国生物类研究机构的前列，综合实力得到进一步提升，并取得了重要科研成果和重大进展。我们相信，经过三期知识创新工程的动物研究所完全有可能接近，甚至达到国际一流水平，在国际动物学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为了缅怀为动物学与动物研究所的创建与发展做出贡献的前辈们，弘扬动物研究所的优良传统，激励年轻一代动物学工作者再接再厉、奋发向上，不断把我国的生物科学事业推向前进；同时又考虑到这些珍贵史料及时整理和抢救工作的紧迫性，我们编辑了这本《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大事要览》（简称《要览》）。

《要览》既不同于一般的大事记，又不同于史料汇编。因为前者过于简略，后者则需要庞大的篇幅。本《要览》以动物研究所建所以来历年发生的比较重要的事件为中心，摘录重要史料，并对这些史事的原委和相关联的情况加以简述。希望通过纵览全

书，得以了解动物研究所的发展轮廓和史实梗概。作为背景，一些全所性的重要活动和事件也做了辑录，但一般不录其来龙去脉，内容从简。

本《要览》按年代顺序对动物研究所的历史重要事件做摘要式叙述，它是一本了解动物研究所发展史的入门书，也是研究当代中国生物科学、动物学、昆虫学发展史的参考书，是一本可备查考的工具书。另外可供本所职工、研究生作为“所史”教育用书。

本《要览》是《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简史》的姊妹篇，可起相互补充和引证的作用。

本《要览》在编写过程中，自始至终得到了本届所领导班子的关心、支持和经费的资助；综合档案室为编写人员查阅原始资料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并给予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本《要览》主要取材于动物研究所综合档案室保存的永久性档案和有关的出版物，新中国成立前的重要事件主要取材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保管的有关档案和出版物。由于编写所涉及内容繁多、历史跨度大、部分档案不完整，加之初次尝试编辑这样的史料，受水平所限，难免出现遗漏和错误，敬请读者指教，以便适时勘误修正。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所史编撰委员会

2006年12月8日

# 凡 例

1. 本《要览》是动物研究所所史专题资料之一，它记录了研究所的建立、成长、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事件、主要人物活动以及反映研究所对国家、社会做出贡献的史料。

2. 坚持尊重历史，力求材料详实、准确并反映研究所特色。

3. 本《要览》以事件为中心主题，在内容的时间跨度上，一般都向前后延伸，包括事件的酝酿过程、结果等。

4. 在编排上，按主题条目的年、月、日时间为序。同一年份内的时间先后顺序明确者，年份从略；在同一年份内多次出现的主题条目或虽属同一年份，但月、日时间不明确的主题条目均放在其他重要事件中列出。

5. 由于各类事件的史料不同，各条目的内容繁简不一。对篇幅过长的条目均做了适当的删节。

6. 需加注释者，在文中加注或在该条目参考文献下端加脚注，并标以\*。

7. 引用的史料，一般为择要摘录。引用原文时，加引号“”表示。对原文中的错字、漏字，一般均予以更正，不另说明。

8. 引用的文献，在文中相应处右上方加 [1]、[2] ……标号（个别条目除外）。在每个条目之后按顺序列出全部文献：

(1) 引用书刊包括：作者、标题、书刊名、出版者或卷期、年份、页码。

(2) 引用院、所档案资料包括：单位、档案载体、标题、案卷号、保管期限。

如：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 1928 年度总报告》，全宗号：393，案卷号：2799”；②“动物研究所文书档案，《昆虫研究室 1951 年工作总结》，案卷号：1951-03-002，永久”；“动物研究所科研档案，《中苏科学院紫胶工作队工作报告》，档号：11-01-002，永久”；③“中国科学院档案，《中国科学院第 37 次院务汇报记录》，办永 50-5”、“中国科学院档案，《讨论动植物研究所改组事宜座谈会记录》，计长 50-4，生永 60-16”（其中“办”、“计”、“生” ……分别代表院办公室、计划局、生物学部 ……等；“永”、“长”、“定” 分别代表该案卷的保管期限“永久”、“长期”、“定期”；“50”、“60” ……分别代表年份；“5”、“4”、“16” ……分别代表案卷排列顺序）。

9. 本《要览》中记事自 1915 年起至 2005 年 12 月底止。

10. 本《要览》仅将 1950 年至 1979 年出版的专著编入，1980 年以后出版的专著已编入动物研究所年度成果简介、著作目录，本《要览》不再辑录。



# 目 录

序言	
前言	
凡例	
新中国成立前的三所·····	1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两所·····	49
两所合并时期·····	120
“文化大革命”时期·····	134
恢复发展时期·····	157
全面落实所长负责制时期·····	192
综合配套改革与运行机制转换时期·····	225
开拓创新时期·····	310
后记·····	389

# 新中国成立前的三所

(1915—1949年)

## 1915年

10月25日 中国科学社成立

由任鸿隽、杨铨、胡明复、赵元任、周仁、秉志、过探先等一批专习自然科学的留美中国学生，于民国4年10月25日（即1915年10月25日）在美国伊萨卡（Ithaca）组织成立“中国科学社”。这是中国第一个由中国人自办、自管的综合性学术团体，其目的在于传播科学，创导实业，以科学救中国。该社自成立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历时35年，成为全国影响最大、覆盖最广的综合性学术团体。《中国科学社二十周年纪念大会记盛》，《科学》19（12），1906页，中国科学社发行，1935年12月。

1915年 秉志首篇学术论文“加拿大金杆草上虫瘿内的昆虫”发表

1915年秉志撰写“加拿大金杆草上虫瘿内的昆虫”一文，刊登在美国《Pomona 昆虫学与动物学杂志》第7卷第3期上<sup>[1]</sup>，这是秉志首篇学术论文。同年，秉志撰写的《疟蚊》发表在《科学》杂志第1卷第11期和第12期及第2卷第1期上<sup>[2]</sup>，是我国学者第一篇医学昆虫论文，也是我国学者在中国自办的科学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昆虫学论文<sup>[1]</sup>。

[1] 王思明、周尧，《中国近代昆虫学史（1840—1949）》，37—38页，121页，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 秉志，《疟蚊》，《科学》，1（11）：1303—1315，（1915）；《科学》，1（12）：1428—1442，（1915），2（1）：83—90，（1916）。

## 1922年

8月18日 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成立

### （一）成立经过

1921年秋，中国科学社董事会委任秉志、胡先骕、杨铨为筹备委员负责筹备建立生物研究所。1922年8月18日，我国最早的生物研究机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成立，在南京成贤街文德里社址举行了开幕典礼。开幕式由科学社社员、北京大学生物系主任谭仲逵教授主持，所长秉志讲话，中国科学社社员、著名学者梁启超做题为“生物学在学术界之位置”的报告<sup>[1]</sup>。

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所址设在南京，由著名动物学家、中国科学社的主要发起人之一秉志任所长。下分动物、植物两部，著名植物学家胡先骕任植物部主任（1929年

钱崇澍接任主任)。该所着重于我国动植物的调查、分类研究，同时也进行一些生物的解剖、生理和生化研究<sup>[1-3]</sup>。

## (二) 沿革

1926年2月，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资助该所经费每年1.5万元，为期3年。1929年6月，该会继续资助了生物研究所3年的经费，第1年5万元，其中：2万元用于建筑研究室，3万元为研究经费，后两年各给4万元。1930年，该会又捐助了该所建筑费2万元，科学社另筹2万元<sup>[4,5]</sup>，建造了一座三层楼，作为实验室、养殖室、标本展览室及图书室。由于经费较为充裕，则向欧美各国订购了书籍、仪器设备以及化学试剂、药品等其他必需品。随后，动物部又增聘王家楫（中央大学兼职）为研究指导员；陈月舟（中央大学兼职）为绘图员；增聘王家楫为教授，徐锡藩、何锡瑞、郑集、张孟闻等人为研究员；增聘陈进生为助理等。植物部增聘8人（研究员7人；助理1人）<sup>[4,6]</sup>。

1934年动物部下设生理学和生物化学两个研究室。到抗战前夕，该所的研究工作除动植物调查和分类外，还涉及植物形态学、植物生态学、动物生态学、动物解剖学、动物组织学、生理学和生物化学等学科领域，早期还有一部分动物遗传和动物行为的研究。随着科研条件的改善及人员的增加，科学研究工作渐有成绩，也渐为科学界所关注。许多著名生物学家曾在此从事研究，接受研究工作的训练，并开始其研究生涯。如原生动物学家王家楫、倪达书，鱼类学家张春霖，兽类学家何锡瑞，两栖爬行动物学家张孟闻，无脊椎动物学家喻兆琦、谢淝成、曾省，组织与胚胎学家崔之兰，生理学家张宗汉，生物化学家、营养学家郑集，植物学家耿以礼、方文培；林学家郑万钧、吴中伦，神经学家欧阳翥等，皆为20世纪20年代我国生物学发轫期之俊彦<sup>[7]</sup>。

抗日战争期间该所迁往重庆北碚。在迁重庆期间，由钱崇澍任所长。南京原址三幢研究楼房于1938年为日本侵略军全部烧毁。抗战胜利后，该所寄寓于上海市陕西路中国科学社明复图书馆楼上勉强维持工作<sup>[4]</sup>。

该所的研究成果发表在《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丛刊》（英文）（*Contributions from the Biological Laboratory of Science Society of China*），该丛刊创刊于1925年，1930年第6卷起分为动物（Zoological series）和植物（Botanical series）两大类，各自成专卷，到1942年停刊，前者出版至第16卷，后者出版至第12卷。自1922—1942年，刊载动物学方面的学术论文112篇，其中包括动物分类、解剖、生理、营养化学等；刊载植物学方面论文100余篇，都属于分类学。1943年出版新1卷第1期，至1949年出版至新1卷第3期终刊<sup>[8,9]</sup>。生物研究所由于研究成绩卓著，很快闻名于世界。该所的建立是中国近代生物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培养了许多大学师资，许多后来建立的生物学研究机构，都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它，终成为中国现代生物学的摇篮。

[1] 《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开幕记》，《科学》，7（8），846—848页，1922年8月，中国科学社发行。

[2] 薛攀皋，《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中国最早的生物学研究机构》，《中国科技史料》13（2），1992。

[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南京），《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第一次十年报告》，全宗号：284，案卷号：195。

[4] 《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科学》，14（1），134—135页，中国科学社发行，1929年9月。

[5] 《科学》，14（9），1464页，中国科学社发行，1930年5月。

[6] 《科学》，14（4），604—605页，中国科学社发行，1929年12月。

[7] 转引胡宗刚，《静生生物调查所史稿》，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2005，山东教育出版社。

[8] 薛攀皋、季楚卿、宋振能，《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发展史事要览（1949—1956）》，第45页，中国科学院院史专题资料（1），中国科学院院史文物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1993年）。

[9] 《科学》，14（5），752—753页；中国科学社发行，1930年1月。

## 1924年

### 9月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成立

1924年5月，美国众参两院通过了第2次退还庚子赔款，用于发展中国教育文化事业的议案，为了充分利用这笔款项，更大限度地发展事业，中美两国有识之士，决定成立“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以管理此项资金。

1924年9月，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正式成立，由15位董事组成。

1925年6月，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召开第1次年会，临时董事长范源濂致词，称：“本会所经管赔款为美国第2次退还之赔款，第1次退还纯成为两国政府间交涉之结果，此次则多由于民间协商而政府助成之……故信此举于中美两国政府及人民之友谊上甚为有益”<sup>[1,2]</sup>。

[1] 引自胡宗刚，《静生生物调查所史稿》，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2005，山东教育出版社。

[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南京），《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1次年会会议记录》，全宗号：484，案卷号：002。

## 1925年

### 1925年 陈桢发表首篇遗传学论文“金鱼外形变异”

陈桢在《科学》第10卷第1期上发表了“金鱼外形变异”学术论文，这是中国学者发表的首篇遗传学论文<sup>[1]</sup>，该论文用进化论的观点论证了金鱼起源于野生的鲫鱼。同年又在《科学》第10卷第3期发表了《金鱼的变异与天演》<sup>[2]</sup>。

[1] 郭鄂、钱燕文、马建章，《中国动物学发展史》，第12页，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

[2] 《科学》第10卷3期，304—330页，1925年6月。

## 1926年

### 1926年 王家楫在中国首次发表“原生动物的生物学和生态学”论文

1926年王家楫发表“原生动物的生物学和生态学”，这是中国首次发表的原生动物的生态学论文。郭鄂、钱燕文、马建章，《中国动物学发展史》，第12页，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

## 1927年

### 10—12月 秉志自垫经费前往厦门采集动物标本

1927年秋冬两季，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秉农山（秉志）前往厦门采集，历时3

个月。秉志将每月的薪金均捐入该所，为购置书籍仪器及津贴研究生之用，此次采集费乃由秉志自行垫出，所得标本为哺乳类 14 号，哺乳类颅骨 8 号，爬虫类 4 号，鸟类 245 号，鱼类 242 号，海产无脊椎动物 2166 号。张宗汉在浙江嵊县采得鱼 100 余号，鸟 25 号，两栖类 2 号，哺乳类颅骨 1 个。《科学》，13（5），713 页，中国科学社发行，1928 年 5 月。

## 12 月 23 日 教育部长范源濂逝世

原国民政府教育部长范源濂（字静生）在天津逝世，享年 52 岁，朝野人士同声痛惋。中国科学社对《范静生先生小传》有这样的评价：“先生为人精敏勤谨，事无巨细，率能尽其条理；自奉甚约，而对人宽厚有容，一秉至诚，故朝野内外，翕然景仰；屡长教衡，学制大政，悉取决于先生之手。盖近 20 来年，以一人而关系全国教育兴废之重，未有若先生者也”。蔡元培的评价：“范公一生努力教育事业，未尝稍息，并尽心提倡科学，匡助研究事业，不遗余力；……”。《科学》，13（1），149—150 页，中国科学社发行，1928 年 1 月。

# 1928 年

## 3 月 4 日 中国科学社在南京召开范静生先生追悼会

中国科学社在南京召开范静生先生追悼会，蔡元培主席首先致辞，继而竺可桢宣读祭文，柳诒征做演说，胡先骕讲述了范公在抱恙之际，在病榻间，仍置有生物标本及图书等物，潜心观察，未尝片刻忘之，以证先生好学求知之力矣。并言：“先生久欲创设生物研究所于北京，几经筹划，以经费之梗，迄未完成，病故前三日，犹津津详论其组织焉。今先生既歿，同人应尽力助成此事，以竟先生之志尔。”《中国科学社董事范静生追悼会记略》，《科学》，1929，13（1），1928 年 1 月，中国科学社编辑。

## 4 月 国立中央研究院筹备处组织“广西科学调查团”采集动植物标本

国立中央研究院在筹备期间组织了“广西科学调查团”赴广西采集动植物标本，调查时间 6 个月，12 月返回南京。秦仁昌、唐瑞金负责植物采集，方炳文、常麟定、郑章成负责动物采集<sup>[1-4]</sup>。动植物两组均由柳州赴宜山，西行经九万山、宜北、河池、南丹、凌云、西隆、八达山等处，后折向南行，调查百色、天保镇边十万大山等处，再折向东至瑶山、古化等地调查，以三江为终点，全程约 3600 余里<sup>[3]</sup>。采集成绩甚佳，共获哺乳动物 40 余种，290 余号；鸟类 330 余种，1400 余号；爬行类 50 余种，200 余号；两栖动物 30 余种，330 余号；鱼类 110 余种，800 余号；无脊椎动物 700 种，5000 余号。另捕获活动物猴、豹、豪猪等 20 余头，圈养在自然博物馆动物园内。采集各类植物标本 3400 余种，约 3 万余号<sup>[3,4]</sup>。此次调查不仅获得丰富的动植物标本，也为中央研究院决定建立自然历史博物馆奠定了基础。

[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 1928 年度总报告》，全宗号：393，案卷号：2799。

[2] 《科学》，13（5），684 页，中国科学社发行，1928 年 5 月。

[3] 《广西科学调查团成绩之一斑》，《科学》，13（9），1264—1265 页，中国科学社发行，1928 年 9 月。

[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南京），《科学调查团动植物工作报告》，全宗号：393，案卷号：2147。

6月9日 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

### (一) 成立经过

据《中央研究院史初稿》记载：“民国13年（1924年）冬，孙中山先生离粤北上时，曾拟设立中央学院为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以奠定革命建设之基础。命汪兆明、杨铨、黄昌谷起草学院计划。不幸翌年3月病逝，此议遂无由实现”<sup>[1]</sup>。

中央研究院的真正筹设，是在北伐战争胜利后，在蔡元培、李煜瀛（即李石曾）、杨铨和学术界的许多专家学者共同努力下实现的。

1927年4月17日，在南京政府成立前一天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74次会议上，李煜瀛提出设立中央研究院案，议决由李煜瀛、蔡元培、张人杰共同起草组织法。5月9日，中央政治会议第90次会议又议决设立中央研究院筹备处，并推定蔡元培、李煜瀛、张人杰、褚民谊、许崇清、金湘帆为筹备委员。6月13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105次会议通过了设立大学的提案。6月17日，南京国民政府任命蔡元培为大学学院院长。6月27日，中央政治会议第109次会议通过了中央法制委员会拟送的《中华民国大学院组织法》，并于7月4日由南京政府公布。该《组织法》规定：大学院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管理全国学术及教育行政事宜；大学院设立中央研究院……等国立学术机关。至此，筹设中的中央研究院遂成为大学院的直辖机关之一。

1927年10月1日，大学院成立，蔡元培宣誓就任大学学院院长职，原教育行政委员会即撤销归并。随后，蔡元培根据大学院组织法聘请学术界人士王小徐、胡刚复、王世杰等30余人为中央研究院筹备委员。1927年11月20日，蔡元培在大学院会议厅主持召开了中央研究院筹备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大学院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该《条例》第一条规定：“本院定名为中央研究院，为中华民国最高科学研究机关”，第4条规定：“本院设院长1人，……以大学学院院长兼任。设秘书1人，……暂以大学院教育行政处主任兼任”，于是，中华民国大学学院院长蔡元培兼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大学院教育行政处主任杨铨兼任中央研究院的秘书长<sup>[2-4]</sup>。

### (二) 沿革

1928年4月10日，国民政府公布《修正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改“中华民国大学院中央研究院”为“国立中央研究院”，从此，中央研究院脱离大学院而成为独立的学术机关。1928年4月23日，国民政府特任蔡元培为中央研究院首任院长（此时蔡元培仍是大学学院院长，但不是以大学学院院长兼中央研究院院长）。

1928年6月9日，蔡元培院长在上海东亚酒楼召集国立中央研究院第1次院务会议，从此中央研究院正式宣告成立，以后即定这一天为院庆。国立中央研究院是我国20世纪前期最大最重要的学术研究机构，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现代有系统的科学研究事业的开端，在中国近代科技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1928年8月17日，蔡元培呈辞大学学院院长等职，仅保留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并获准。11月9日，公布修正的《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法》，《组织法》第1条规定：“国

立中央研究院直隶于国民政府，为中华民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第4条规定：“国立中央研究院设总干事1人”，即改秘书长为总干事，仍由院长聘杨铨担任，设总办事处于南京成贤街57号法制局旧址内，1928年11月正式开始办公<sup>[2-4]</sup>。

在中央研究院宣告成立时，已筹设最初的几个研究所。先是理化实业研究所（1928年7月为物理、化学、工程3个研究所）、地质调查所（1928年1月改称地质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1928年5月正式成立）和观象台（1928年2月为天文、气象2个研究所）4个研究所。1928年10月，成立了历史语言研究所；1929年1月筹备自然历史博物馆（1930年1月正式成立，动植物研究所的前身）；1929年4月成立心理研究所<sup>[4]</sup>。至1930年，中央研究院共成立了10个研究机构。据1931年3月统计这10个研究机构共有专任研究员、技师、编辑员59人，兼任研究员5人，名誉研究员2人，特约研究员、编辑员、外国通讯员、顾问等63人，助理员、调查员、技术员、练习生等141人，总计270人<sup>[5]</sup>。到40年代初下属所发展到23个，成为民国时期隶属于国民政府的最大的综合性科学研究机构，这支队伍对中国近、现代科学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1] 薛攀皋、季楚卿、宋振能，《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发展史事要览（1949—1956）》，第12页，中国科学院院史专题资料（1），中国科学院院史文物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1993年）。

[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1928年度总报告》，全宗号：393，案卷号：2799。

[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概况》，全宗号：393，案卷号：001。

[4] 《中央研究院为教育年鉴编造“中央研究院概况”（1932—1947年）》，全宗号：393，案卷号：80。

[5] 林文照，《中央研究院的筹备经过》，《中国科技史料》，第72页，9（2），1988年。

## 10月1日 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成立

### （一）成立经过

1928年1月，尚志学会（1919年由范静生发起组成，主要成员为早年留日学者梁启超、江庸、王家驹、王文豹、马麟翼等人）嘱托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中美庚款所属）组织创办生物调查所，并允拨付资金，以作该所基金<sup>[1]</sup>。尚志学会就此拟出《合组办法》。

1928年2月，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回复尚志学会，并对其所拟的《合组办法》草案提出了修正意见。

1928年5月，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致函中国科学社理事会，商借秉志北上支持静生生物调查所，暂以每年4个月或半年为期。5月31日，科学社理事会在南京成贤街社址开会，议决此案，惟以每年2个月为限。

1928年6月19日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4次董事会，正式通过接受尚志学会嘱托，组织静生生物调查所，议决聘请江庸、陈宝泉、王文豹、翁文灏、祁天锡、周诒春、丁文江、任鸿隽、范旭东为静生生物调查所委员会委员，秉志为所长<sup>[2]</sup>。

负责筹建该所的是当时南京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所长、动物学家秉志和植物学家胡先骕。1928年7月，秉志、胡先骕赴北京，负责组建该所。7月18日，根据静生生物调查所委员会第1次会议记录：在南长街22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事务所召开成立会议，委员王文豹、陈宝泉、祁天锡、翁文灏、周诒春、任鸿隽出席会议。所长秉志列席会议。会议由周诒春代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临时主席，通过议案有<sup>[3]</sup>：

1. 《静生生物调查所委员会章程》。
2. 《静生生物调查所计划及预算》。
3. 推举任鸿隽为委员会主任、翁文灏为书记、王文豹为会计等，这些职位皆为名誉职位。

4. 秉所长提出请胡先骕为植物部主任，月薪 300 元；寿振黄为动物部副教授（技师 1928—1941 年），月薪 250 元，刘崇乐兼任动物部教授，月薪 150 元。会议主席说明所长秉志不能常居北京，其不在时所长一职由胡先骕代理。

5. 会议决定静生生物调查所正式成立日期为民国 17 年（1928 年）10 月 1 日。所址设在北平（今北京）西城石驸马大街 83 号范源濂故居。

1928 年 10 月 1 日上午 10 时，举行开幕典礼，到会者有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职员、尚志学会职员、该所委员会委员、该所职员、北平博物学会职员、各学校生物教授，中西来宾 50 余人。会议由主席周寄梅先生主持，著名实业家范旭东先生（范静生胞弟）陈述范静生先生生平事迹，言时声泪俱下，听者动容；然后由江翊云先生代表尚志学会致辞，说明设立静生生物调查所以纪念静生先生的理由，并对于基金董事会及所内职员的热心赞助深表感谢；再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顾临代表董事会说明本会与尚志学会合办静生生物调查所的旨趣；所长秉志先生报告了静生生物调查所今后的工作计划<sup>[4]</sup>。会后，与会人员在所长秉志和植物部主任胡先骕的陪同下参观了该所动植物标本、书报等。

## （二）沿 革

该所创办初期，设动物、植物两部，秉志任所长兼动物部主任，胡先骕任植物部主任。1931 年该所迁入西安门内文津街 3 号新建楼房。并将旧址改为通俗博物馆。1932 年 1 月，秉志因“南北奔走，兼理两所，辛卒少暇，苦无治学之时”，辞所长职，专任静生生物调查所动物部教授，所长之职由胡先骕继任<sup>[5]</sup>。1934 年，该所与江西农业院合办庐山森林植物园。1938 年，该所与云南省教育厅在昆明合办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抗日战争期间，静生生物调查所部分人员迁往江西省泰和县，后来一部分人员又西迁云南。抗战期间，因经费不足停办动物部，抗战胜利后复员回北平，只恢复了植物部<sup>[6]</sup>。

该所动物部以往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将采集所得的标本进行详细的分类研究。所长兼动物部主任秉志侧重研究中国软体动物、腹足类的分类及中国白垩纪化石昆虫、北方化石田螺、鱼类、爬虫及软体动物化石；技师\*寿振黄侧重研究中国的鸟类、鱼类、两栖类；技师张春霖研究云南、福建、广东、广西、河南、河北及吉林的两栖类爬虫与中国的鲶科；技师喻兆琦研究虾类、寄生等足类、寄生桡足类等甲壳动物；技师杨惟义研究中国螞象亚科分类及中国昆虫的分布；研究员\*沈嘉瑞研究华北的节足动物；研究员何琦研究海南及北平的蚊蝇等，研究成绩斐然。据不完全统计共计发现新属、新种 54 种，并纠正以前欧、美、日等国研究的错误颇多。历年来所研究的成果除了在《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及国内外杂志上发表论文（66 篇）外，编写并出版的专著有：《华北蟹类志》、《中国鲤科志》、《河北鸟类志》（2 卷）、《中国昆虫目录》（6 卷）、《河北习见鱼类图说》等 11 卷（册）<sup>[7]</sup>。编写有关植物学方面的专著 13 卷（册）<sup>[7]</sup>。

该所的采集工作始于研究所成立初期，采集调查足迹遍及河北、河南、山东、东



北、广东、广西、四川、湖南、浙江、福建、江西、云南、海南等地，采集工作长达 10 余年之久（云南植物），其中云南植物采集先后 14 年之久，时间最长，所得标本不下 10 万余号，其中有经济价值和新奇的不在少数。故云南长期采集的收获为今后编著的《中国植物志》做好了铺垫。动物采集遍及沿海一带，远达海南，得到昆虫、脊椎动物（哺乳类、鸟类、鱼类）、无脊椎动物标本 15 万余号，有些标本极为珍贵。1934 年 1 月该所会同中央研究院和中国科学社有关专家组成“海南生物采集团”赴海南采集，足迹遍全岛，共采获昆虫 1.5 万号，无脊椎动物 1 万余号，脊椎动物 5000 号；菌类及植物标本 4000 余号。加之接收国内外赠送标本，该所收藏动物标本多达 35.7 万余号，植物标本 21.9 万余号<sup>[8,9]</sup>。

该所保存在北平图书馆的图书约 10 万册，该所印刷品约 2 万册，欧美各国杂志 300 余种，约 1 万册<sup>[8,9]</sup>。

该所出版的《静生物调查所汇报》（*Bulletin of Fan Memorial Institute of Biology*）以英文刊出，创刊于 1929 年 5 月，每年出 1 卷。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动物部出版至第 10 卷 3 号（期）。植物部出版至第 11 卷第 2 期停刊。在刊行的 10 余年中，共登载 68 位学者 269 篇论文，其中：动物方面 133 篇<sup>[7,10]</sup>，多有昆虫著作。1935 年荷兰权威的 *Chronica Botanica* 杂志曾著专文报道该刊。至 40 年代《汇报》共与国内外 200 多个研究机构建立交换关系，在国内外生物学界具有相当大的影响。该所与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成为了中国最早期动、植物学家的摇篮。该所还与南京生物研究所合刊《中国动物学杂志》（*Zoologica Sinica*）。

[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南京），《尚志学会初拟与中基会合组静生所办法》，全宗号：609，案卷号：002。

[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南京），《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三次报告》，1929。

[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南京），《静生物调查所委员会会议记录》，全宗号：609，案卷号：003。

[4] 任鸿隽：《静生物调查所开幕记》，《科学》，13（9），1263—1264 页，中国科学社发行，1929 年 4 月。

[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南京），《静生物调查所职员录及一览表》，全宗号：609，案卷号：004。

[6] 中国科学院档案，《中国科学院接管各研究机构概况》，办永 50—25。

[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南京），《静生物调查所工作报告和概况》，全宗号：609，案卷号：007。

[8]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南京），《静生物调查所（第 6 次年报）1934 年年报》。

[9]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南京），《中央研究院工作报告（1935 年 11 月）》，全宗号：393，案卷号：66。

[10] 中国科学院资料汇编，《中国科学院各单位出版情况统计表》，第 114 页，1950 年，第一集，院办公厅编印。

※注：当时静生物调查所的研究技术职称：技师相当于现在的研究员，副技师相当于现在的副研究员，研究员相当于现在的助理研究员。

## 1928 年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 4 次报告

静生物调查所在酝酿建所之时，即仿美国生物调查所借助国会图书馆的前例，而依托国立北平图书馆，因经费充足，其购置的生物学文献也甚齐备。是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发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 4 次报告》，内容涉及国立北京图书馆与静生物调查所两机构合作，有如下记录：

“本年静生物调查所成立，北平图书馆特提出一部分购书费，专购生物学书籍，借供研究用。已购自创刊号起的全部动物及植物学杂志 12 份，时间最长的有发行 132 年的历史，最近的亦已刊行数十年。至于卷帙繁重的参考书，与最近发行的杂志，尤属应有尽有。同时，该馆还收集了世界著名的其他科学杂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 4 次

## 1929 年

### 4 月 静生生物调查所所长秉志兴建所址的议案被获准

静生生物调查所所长秉志因该所现址石驸马大街的房舍属民居，而且面积只有 300 平方米，难以适应研究所的事业发展，在静生生物调查所第 3 次委员会会议上他提出兴建所址的议案。据《会议记录》载：“所长报告现在所址过小，本年采集完毕，无余屋可供整理、鉴定、陈列之用，应请委员会从速设法补救，庶期今秋工作不至停顿。经合众讨论，丁文江委员动议由委员长筹集建设费 1 万，并请基金拨给 1.5 万元，即在基金会所有之养蜂夹道迤西空地上建筑新屋，得江庸附议，获全体赞成通过。此议案从动议到建成只用了两年时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南京），《静生生物调查所委员会会议记录》，全宗号：609，案卷号：003。

### 9 月 9 日 国立北平研究院成立

#### （一）成立经过

1927 年 5 月 19 日，中央政治会议采纳蔡元培、张人杰、李煜瀛（李石曾）等人的建议，设立中央研究院，以蔡元培等为筹备委员。李煜瀛在中央政治会议上报告局部或地方研究院的拟议，并定中央研究院每月经费为 10 万元，地方研究院每月经费 5 万元。

1928 年 9 月 21 日，李煜瀛代表大学委员会列席国府会议，说明北平大学组织与预算，每月经费定为 30 万元，暂以十分之一为北平研究院经费。此款并先后向财政教育当局陈述。北平研究院遂随北平大学通过于国民政府会议。

北平研究院 1928 年 11 月开始筹备。最初由北平大学正副校长负责筹备，1929 年 5 月筹备委员会成立，由李煜瀛任筹备委员会主任，蔡元培、张人杰及学术合作机关代表等为筹备委员。1929 年 8 月 6 日，行政院会议通过了“国立北平研究院”为独立的学术研究机构。

1929 年 9 月 9 日国立北平研究院在北平正式成立。院长李煜瀛、副院长李书华。设立总办事处，先后成立物理学、镭学、化学、药物、生理学、动物学、植物学、地质学、史学等各研究所；并与国立西北农学院在陕西武功合组中国西北植物调查所<sup>[1,2]</sup>。

#### （二）沿革

1935—1936 年（七七事变前），因北方形势日趋严重，该院先将植物学研究所图书、标本、仪器及工作人员全部迁往陕西，史学研究所一部分亦迁陕，镭学、药学两所及物理学、化学两所一部分图书、仪器迁沪，迁出的各部分照常工作。1937 年平津沦陷后，该院在北平的工作即告停顿，同时，经费亦因战事停发数月。李书华副院长前往云南筹划迁院事宜。1938 年 4 月，该院在昆明黄公东街设立了办事处，随后，该院总办事处及物理学、化学、生理学、动物学、史学各研究所相继抵达昆明，继续工作。抗战胜利后，1946 年，该院陆续全部复员。1945 年 10 月 17 日，国民政府公布，规定该

院设物理学、原子学（系原镭学改之）、化学、药学、生物学、动物学、植物学、史学 8 个研究所<sup>[1,2]</sup>。

抗战期间，该院在北平原有房屋均被敌伪占用，三贝子花园动物学、植物学、生理学 3 个研究所被伪教育总署华北气象台、寺内寿一、伪华北农事试验场、2083 部队仓库所占。日本投降后，该院陆续收回。总办事处仍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西四所；动物学、植物学两个研究所及生理学研究所的一部分仍在西直门外三贝子花园内<sup>[1]</sup>。

[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南京），《国立北平研究院概况（1929.9—1948.8）》，全宗号：394，案卷号：001。

[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南京），《国立北平研究院 1937—1944 年工作报告》，全宗号：394，案卷号：035。

## 9 月 9 日 国立北平研究院动物学研究所成立

### （一）成 立

1929 年 9 月 9 日，北平研究院动物学研究所宣告成立。所长为专任研究员、动物学家陆鼎恒（惟一）。所址设在北平西直门外天然博物院（即三贝子花园，现今的北京动物园）内，就广善废寺加以改建，分前后两部：前部设标本陈列室，供群众观览；后部为研究室、实验室、图书室等。1934 年 10 月，在该寺北侧新建的生物楼（即陆谟克堂）竣工，研究室一部迁入该楼工作。当时，有专任研究员张玺，兼任研究员汪德耀<sup>[1]</sup>。其研究工作偏重于北方和沿海动物的调查、采集和分类研究。每年定期派员赴我国沿海主要地点如青岛、烟台、威海、胶州湾、厦门、广东一带采集标本，并就地研究其生活分布状态<sup>[1]</sup>。

### （二）沿 革

抗战前该所的研究工作侧重在海产动物的研究，如：鱼类、原索动物、软体动物、棘皮动物、节肢动物等方面的调查、采集和分类研究。其中以胶州湾及其附近海洋理化性质的调查及其动物的分布研究相当周详，尤以原索动物的柱头虫及文昌鱼的发现，在动物界为一重要贡献<sup>[1]</sup>。1932 年，该所即向烟台地方当局借得旧海军练习营一处房舍作为所址，设立“烟台海滨生物研究室”，后因该所无长期驻守人员，加之胶东战事影响，暂陷停顿。1933 年 11 月，烟台博物馆筹设成立，其标本的采集及鉴定，由该所派张凤瀛前往担任。海滨生物研究室亦得于此时复活，设于该博物馆内，次年因烟台各博物馆馆址迁移，海滨生物研究室遂复停顿。1935 年春季，该所又向驻烟海军办公处借得一处房舍，设立烟台海滨生物研究室，并于 4 月 20 日正式成立，命名为“烟台海滨动物研究室”，由该所助理员张修吉常驻烟台工作。同年 6 月，根据“太平洋科学协会海洋组中国分会的议决案”，更名为“渤海海洋生物研究室”，以期与定海、厦门、青岛三处的研究室名称划一<sup>[2]</sup>。该室设有养殖室（观察动物生态，有时养殖）、标本整理室（对日常采集之标本分门别类，急行整理，绘略图或标本登记）和标本陈列室（因参考书籍为数不多，为参考便利，将书架也附设于室内）<sup>[3]</sup>。同年，该所增设细胞学及实验发生学研究室，聘兼任研究员朱洗主持。

1937 年，北平沦陷，该所随院迁滇。抵滇后，先后借昆明市翠湖通志馆一部分房屋，后于昆明西山之麓，滇池之滨，租苏家村小学的一部分及自建茅庐一所作研究室。

由北平经香港、海防抢运出的图书、仪器相继抵达昆明，研究工作遂逐渐展开<sup>[1]</sup>。

迁滇后，因环境的需要，注重云南水产经济动物及淡水渔业，便将研究工作的重点转到云南水产经济动物的调查与研究，并与云南建设厅合组云南水产试验所，由张玺兼任所长，共同研究名贵鱼类的繁殖及推广，并以人工授精孵化法繁殖云南名产的青鱼，极为成功。先后完成论文共计 20 余篇，其中中外各杂志发表论文 19 篇<sup>[1,4]</sup>。

1946 年 9 月，该所全部人员由昆明迁回北平，由于原所址的研究室、实验室、标本陈列室及图书室等被敌伪侵占，损毁严重。1947 年 3 月和 1948 年 1 月由昆明急运的第 1 批图书、仪器及第 2 批标本先后全部到达北平。此时，原所址的修缮工作已经全部完工，研究工作乃得展开进行，并注重水产动物及昆虫的调查与研究。张玺、沈嘉瑞主持水产动物的研究；朱弘复主持昆虫研究，在最初的几年中，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鳞翅目幼虫及叶蜂的分类研究。1946 年 9 月，在原有实验动物学研究室、海洋动物研究室、组织学与发生学研究室的基础上增设甲壳类动物研究室，聘专任研究员沈嘉瑞主持之；增设昆虫学研究室，聘专任研究员朱弘复主持<sup>[1,2,5]</sup>。

该所历年来曾先后完成学术论文共计 80 篇，分别刊载于国内外杂志上；其中 44 篇分别刊载在该所的《丛刊》和《中文报告汇刊》上；36 篇分别刊载在国内外有关杂志上<sup>[1]</sup>。

1948 年，该所有各类动物标本共计 12 000 余号，其中：节肢动物标本 4351 号；软体动物标本 3851 号；鱼类标本 1895 号；两栖爬类标本 291 号；鸟类标本 475 号；哺乳类标本 120 号；其他动物（海绵、腔肠、棘皮、原索、蠕形等）标本 1695 号。另有昆虫标本 20 000 号；收藏动物专门书籍达 2000 余卷，中西文及日文杂志 500 余卷<sup>[1,5]</sup>。

抗战前该所南院原有标本陈列室，共有脊椎动物标本 1000 余号；抗战期间，损失过半，所剩仅 400 余号，陈列在北平市政府农林实验所动物园标本室内，供大众阅览。

该所出版的刊物有：《国立北平研究院动物学研究所丛刊》（英文）（*Contributions The Institute of Zoology National Academy of Beiping*）和《国立北平研究院动物学研究所中文报告汇刊》，前者创刊于 1932 年 1 月，不定期刊物，出版至第 5 卷第 5 期；后者创刊于 1929 年 7 月，也是不定期刊物，出版至第 23 号<sup>[6]</sup>。

1947 年，该所有科技人员 13 人，其中：专任研究员 3 人（张玺、沈嘉瑞、朱弘复）；通讯研究员 2 人（陈桢、童第周）；助理研究员 3 人（成庆泰、夏武平、齐钟彦）；助理员 2 人（刘瑞玉、邓国藩）；技术人员 3 人（马绣同、王璧曾、王林瑶）<sup>[7]</sup>。

[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南京），《国立北平研究院概况（1929.9—1948.8）》，全宗号：394，案卷号：001。

[2] 国立北平研究院第六年工作报告：《动物学研究所工作报告》，第 76—77 页，1935 年。

[3] 张修吉：《渤海海洋生物研究室概况》，国立北平研究院动物学研究所中文报告汇刊，第 15 号，1936 年 1 月。

[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南京），《国立北平研究院 1937—1944 年工作报告》，全宗号：394，案卷号：035。

[5] 《国立北平研究院十八周年纪念会报告（节录）》，科学，30（4），120—121 页，1948 年 4 月。

[6] 《中国科学院各单位出版情况统计表》：《中国科学院资料汇编》第一集，114 页，院办公厅编印，1950 年。

[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南京），《国立北平研究院动物学研究所职员名录》，全宗号：394，案卷号：005。

## 9 月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资助伍献文、谢淝成、喻兆琦留学

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研究员伍献文、谢淝成得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补助金，喻兆琦得到江苏省官费，他们 3 人分别赴法国、德国（谢淝成）留学；助教张宗汉考取赴

美专科生，于8月24日赴美芝加哥大学留学，专攻动物生理学。《科学新闻》，《科学》，14(1)，135页，中国科学社发行，1929年9月。

## 9月28日—11月7日 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标本采集

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动物部王以康、徐锡藩、刘子刚等3位采集员沿长江上游，采集长江流域动物标本。采集足迹遍及宜昌、武昌、汉阳、汉口、长沙、宝庆、岳州、九江、庐山、南昌等地以及洞庭湖、鄱阳湖，采得标本1000余种，7000余号。其中：蠕虫类100种，400余号；昆虫标本700种左右，2000余号；甲壳类10余种，1700余号；软体动物6种，200余号；鱼类60余种，100余号；两栖类10余种，300余号；爬虫类7种60号；鸟类50余种，300余号。《生物研究所采集》，《科学》，14(5)，752—753页；中国科学社发行，1930年1月。

## 11月初 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成立1周年举办展览作为纪念

静生生物调查所成立一年之际，在北平举行展览作为纪念，9月下旬秉志自南京北上，亲自组织并主持展览。展览会于11月初在南池子政治学会大厅举行，展出陈列标本甚多，并展出研究论文6篇，同时发行《静生生物调查所第1次年报》。北方知识界人士参观后，一致赞叹，且惊异1年之内该所取得的成绩如此绚烂，咸谓所务主持得人。展览会结束后，所长秉志即搭车南下，11月14日返回了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静生生物调查所在平举办展览作纪念》，《科学》，14(5)，752页；中国科学社发行，1930年1月。

## 1929年 静生生物调查所动物部的研究成果

1929年静生生物调查所技师寿振黄、研究员何琦在京西一带调查淡水生物，尤其注意鱼类的生活习性及昆虫的分布。研究员沈嘉瑞调查通州及卢沟桥附近具有食用价值的淡水甲壳类；采集员唐善康、唐瑞玉在东陵调查有研究价值的哺乳类、鸟类及无脊椎动物，初步了解河北省动物的分类、分布及与经济的关系。秉志教授发现河南祈川田龟1新属新种；河北井陘及周口店的田螺有12新种；山西汾河、娘子关、大同和陕西潼关等处的田螺有5新种。技师寿振黄研究北京的两栖类共得12种；苏州各处的鱼类有20余种。研究员沈嘉瑞研究北直隶的蟹类有30余种，其中已发现4新种。研究员何琦研究北方疟蚊的生活史，在进行蠕蛹及成虫各时期的观察后，兼调查北京及附近各处两翅类的分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南京），《静生生物调查所工作报告》，全宗号：609，案卷号：007。

## 1929年 静生生物调查所动物部标本采集

静生生物调查所派技师寿振黄及标本制作员唐善康前往烟台、东陵、天津及塘沽采集哺乳类、鸟类、鱼类等标本。研究员沈嘉瑞则赴北戴河、山海关、秦皇岛、登州、青岛等处采集甲壳类、鱼类等标本。

[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南京），《静生生物调查所工作报告》，全宗号：609，案卷号：007。

[2] 《静生生物调查所概况》，《科学》，17(7)，1127—1128页，1933年7月，中国科学社发行。

# 1930 年

## 1 月 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成立

1928 年 4 月，国立中央研究院在筹备期间组织了“广西科学调查团”赴广西采集动物标本，12 月返京，成绩甚佳。该院因有设立博物馆之议<sup>[1]</sup>，1929 年 1 月 11 日，国立中央研究院决定创办博物馆，作为研究及展览之所。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聘任秉志、李四光、钱崇澍、李济、过探先、钱天鹤、颜复礼 7 人为筹备委员。钱天鹤为常务委员并主持筹备工作，设立筹备处于南京成贤街 27 号<sup>[2]</sup>。

1929 年 1 月 30 日，国立中央研究院召开博物馆筹备委员会，决定将该馆定名为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即动植物研究所前身），馆址设在南京成贤街 46 号，占地 9 亩余。并通过职员名单，请院长分别聘任，平日筹备事务，由常务委员会负责进行<sup>[2]</sup>。

博物馆暂分动物、植物两组，主要以国产动植物的分布及类别研究为主。每组除有技师 1 人外，动物组有标本采集员 1 人，标本剥制员 2 人，练习生 1 人；植物组有助理员 1 人，采集员 1 人，标本装置员 1 人，练习生 1 人；全馆事务由主任总负责，此外有文秘 1 人，绘图员 1 人；事务兼会计 1 人；中西文打字员 1 人。

该馆刊物暂定名为生物丛刊（*Sinensia*），内容分丛刊及专刊两类，专载研究学术论文<sup>[2,3]</sup>。

1930 年 1 月，筹备工作就绪，乃取消筹备处。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正式成立，馆址设在南京成贤街 27 号。6 月 13 日，院长蔡元培聘钱天鹤为该馆主任。聘李四光、秉志、钱崇澍、李济、王家楫 5 人为顾问<sup>[4]</sup>。其任务主要是陈列从全国各地送来的动植物标本，同时也做分类学研究。

[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 1930 年度概况》，全宗号：393，案卷号：80。

[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 17 年度总报告》，全宗号：393，案卷号：2799。

[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为教育年鉴编造“中央研究院概况”（1932—1947）》，全宗号：393（2），案卷号：80。

[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聘任卷四宗》，全宗号：393，案卷号：498。

## 4 月 3 日—11 月 3 日 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入川采集动物标本

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入川采集团动物组徐锡藩、刘子刚赴四川采集，途径合川、成都、灌县、嘉定、峨眉、峨边等地，共采集动物标本 800 余种，6800 余号。其中：脊椎动物标本 300 余种 3900 余号；两栖爬虫类 42 种，100 余号；无脊椎动物 530 种，2870 号。《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入川采集队返都》，《科学》，15（3），472—473 页，1931 年 3 月，中国科学社发行。

## 4 月 12 日 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组织贵州自然科学调查团

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组织的“贵州自然科学调查团”出发赴贵州省采集

动植物标本。该团分动物、植物两组，以常麟定、蒋英分别负责采集有关事宜。唐开品、唐瑞金为动物组采集员；黄志为植物采集助理，林应时为秘书，负责全团事务。房子廉为事务会计助理员<sup>[1]</sup>。该团于1930年4月12日由南京出发，途径四川重庆，转入贵州境内，6月13日抵达贵阳后，为工作便利，每组又分为两队。动物组第1队及植物组第1队于1930年6月20日出发，调查路线为自贵阳东行经龙里、麻哈、都匀、八寨折南入三合、都江、荔波、独山，再西行经平舟、大塘、罗解、册亨、南龙、兴义、兴仁、安南、关岭、镇宁、安顺、平坝，12月底返回贵阳；动物组第2队及植物组第2队也于1930年6月20日出发，调查路线为自贵阳西行，经龙里、定番（今惠水）、麻哈、平坝、清镇、修文、黔西、大定、毕节、威宁、水城、织金、平坝，12月底返回贵阳。动物组返回贵阳后，又在附近各县采集两个月，1931年5月考察结束<sup>[1]</sup>。动物组共采得脊椎动物530余种，7000余号。其中：哺乳动物26种，300余号；鸟类280种，3000余号；爬行类30余种，300余号；两栖类35种，400号；鱼类160种，3000号。无脊椎动物标本700余种，6000余号，并捕获活动物百余头<sup>[1,2]</sup>。

[1] 国立中央研究院1930年度总报告：《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1930年度报告》，371—373页，1930年。

[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工作报告》，全宗号：393，案卷号：66。

## 4月下旬 静生生物调查所动物部标本采集

静生生物调查所派采集员至河北、山东两省沿海一带采集标本；同年夏，技师沈嘉瑞赴辽东湾及渤海湾采集海产动物。7月，研究员何琦以及采集员唐善康、唐瑞玉等赴东陵采集鸟类及昆虫标本，共得鸟类标本千余件，此外，尚有不少哺乳类、爬行类及软体动物标本。

[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南京），《静生生物调查所工作报告》，全宗号：609，案卷号：007。

[2] 《静生生物调查所概况》，《科学》，17（7），1127—1128页，1933年7月，中国科学社发行。

[3] 转引胡宗刚，静生生物调查所史稿，第81页，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2005，山东教育出版社。

# 1931年

## 4月 静生生物调查所迁入新址，旧址改作通俗博物馆

静生生物调查所由原所址北平石驸马大街83号迁入西安门内文津街3号新址（与1927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与教育部合办国立北平图书馆毗邻）。石驸马大街83号由范旭东捐款进行装修，改作通俗博物馆，1931年11月开放，馆内陈列室分动物、植物两部，陈列标本依分类顺序排列，其标本数在5000种以上。在抗日战争之前，每年参观人数在万人以上，其中以中小学生为最多。直至1941年12月静生生物调查所被日军强行占领停办为止。

[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南京），《静生生物调查所概况》，全宗号：609，案卷号：007。

[2] 引自胡宗刚，《静生生物调查所史稿》，第28页，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2005，山东教育出版社。

## 1931年 静生生物调查所动物部标本采集

1931年静生生物调查所动物部春夏两季派唐善康、唐瑞玉赴东陵及河北各地采集

鸟兽标本。5月又派采集员赴该处专采森林昆虫标本，秋季，又派员赴山东半岛采集，经胶州湾、成山角、烟台、威海、荣城等处，再到辽东半岛，经安东、牛庄等处，为时3个多月，采集不少两栖类、爬虫类、鱼类，尤以甲壳类为最多；夏间，又派标本制作员唐瑞玉赴吉林采集鸟、兽、鱼类等标本，于10月底返所后，又同技师寿振黄赴怀来调查，采集了大量的脊椎动物标本。8月，又派何琦赴天津采集蚊蝇标本，所获亦甚丰富。

[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南京），《静生生物调查所概况》，全宗号：609，案卷号：007。

[2] 转引胡宗刚，《静生生物调查所史稿》，第81页，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2005，山东教育出版社。

[3] 《静生生物调查所概况》，《科学》，17（7），1127—1128页，1933年7月，中国科学社发行。

## 1930—1931年 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研究成绩

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自1930年1月成立以来，馆内外专家根据该馆动植物材料研究的结果，先后发现颇多新奇种，计动物有1个新亚科；2个新属；3个新亚属；34个新种；7个新亚种。植物有2个新科；1个新属；104个新种；17个新亚种；9个中国新记录<sup>[1]</sup>。

1931年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在动植物的分类研究方面，除在该馆丛刊发表的新种，动物已有40种，植物有73种<sup>[2]</sup>。除此之外，植物技师秦仁昌在1930年4月赴欧研究蕨类植物时发现了中国蕨类植物之新科，定名为 *Sinopteridaceae* 即中国蕨类之意<sup>[2]</sup>；动物技师方炳文发现爬岩鱼新亚科，定名为 *Crossostominae*；发现爬岩鱼3个新属，分别定名为：*Sinohomaloptera*, *Sinogastromyzon*, *Precrossostoma*<sup>[2]</sup>。

[1] 国立中央研究院1931年度总报告，《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1931年度报告》，371—373页，1931年。

[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1931年度概况》，全宗号：393（2），案卷号：80。

## 1931年 中研自然历史博物馆职员一览表

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职员一览表  
(1931年度)

职别	姓名	别号	籍贯	年龄	通信处
主任	钱天鹤	安涛	浙江杭州	40	杭州中皮市巷108号
植物技师	秦仁昌	子农	江苏武进	34	
动物技师	伍献文		浙江温州	36	
动物技师	方炳文	质之	安徽歙县	30	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
秘书	林应时	孔儒	四川大竹	31	本馆
助理员	蒋英	菊川	江苏昆山	33	江苏昆山紫玉街
动物采集员	常麟定	继先	河南开封	31	本馆
植物采集员	陆博镰	静廉	江苏昆山	35	昆山半山桥101号
植物标本装置员	陈长年	钱龄	广西桂林	34	南京三眼井54号
动物标本剥制员	唐开品		福建福州	32	本馆
动物标本剥制员	唐瑞金		福建福州	28	本馆
庶务员	杨隆祐	飭吾	湖南长沙	32	本馆
绘图员	杨志逸	寒松	江苏武进	25	本馆



职别	姓名	别号	籍贯	年龄	通信处
书记	刘勋卓	百恤	江苏武进	24	本馆
植物标本装置练习生	邓世伟	伯斌	贵州清镇	20	贵州清镇县东门
顾问	秉志	农山	河南开封	45	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
顾问	王家楫	仲济	江苏奉贤	34	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
顾问	钱崇澍	雨农	浙江宁海	48	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
顾问	李四光	仲揆	湖北	43	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
顾问	李济	济之	湖北钟祥	36	北方方砖厂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南京），《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 1931 年度概况》，全宗号：393，案卷号：80。

## 1931 年 静生生物调查所研究成绩

1931 年，秉志与闫敦建从事中国软体动物分类的研究。同时，秉志还研究中国白垩纪化石昆虫、北方化石田螺、鱼类、爬虫及软体动物化石，发现了不少新种。寿振黄研究中国鸟类、鱼类、两栖类，成绩甚佳。张春霖研究中国蛇类、蜥蜴类及四川、云南、广东、河北、河南及长江流域各省的鱼类。1929—1931 年，发现 20 余种新种，并纠正了欧、美、日研究人员的不少错误。沈嘉瑞研究华北节足动物，对于蟹类已有详细的调查。何琦调查北平附近的蚊蝇，亦有相当的成绩。他们的研究成绩已在该所及其他研究刊物上发表，几年来共发表研究论文 49 篇。其中：秉志所著的“中国白垩纪之化石昆虫”，“华北之化石田螺”，“河南之化石田龟”，“厦门沿海动物之一——斑虎脑之研究”，“哈尔滨螺类之新种”，“河南安阳之龟壳”，“蒙古螺类化石之二新种”，“蒙古软体动物化石之新种”，“龟类化石之新种”，“抚顺琥珀中拟蜚蠊类昆虫”，“热河之新蜃螺化石”等 12 篇。秉志与闫敦建合著“中国北方螺类之五新种”，“中国沿海腹足类之调查”2 篇。寿振黄著“天津之一新弹涂鱼”，“北平之两栖类”，“浙江嘉兴及新昌之鱼类”，“苏州之鱼类”，“烟台夏季鸟类之观察”，“鲢鳙鱼之生活史”，“四川鸟类报告（上、下）”，“河北省之刺鱼”共 9 篇。寿振黄与张春霖合著“河北省鳅类之调查”，“河北鲤科之调查”论文 2 篇。张春霖著“长江鲤科之调查”，“四川鲤科之调查”，“中国蜥蜴类之调查”，“中国蛇类之调查”，“浙江一新鳅”，“吉林镜泊湖鱼类小志”，“中国鱼类三新种”，“开封一新鱼”，“中国鲤科正名录”，“南京鱼类之调查”，“中国鲤科之新种”，“四川一新鳅”，“四川鲤科之新种”，“中国鲤科之新属新种”，“长江上游之鲤科鱼类”，“白鼠之生活史”共 16 篇。沈嘉瑞著“等足类之一新种”，“河北蟹类之一新种”，“蟹类一新种”，“中国北部蟹类”，“香港蟹类一、二”等学术论文共 6 篇以及何琦著“北平蚊虫之调查”，“麻蝇分类纪要”2 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南京），《静生生物调查所概况》，全宗号：609，案卷号：007。

## 1932 年

### 1 月 秉志辞静生生物调查所所长职

静生生物调查所所长秉志因“南北奔走，兼理两所，辛卒少暇，苦无治学之时”，辞所长职，专任静生生物调查所动物部教授，所长之职由胡先骕继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 1月 静生生物调查所职员一览表

静生生物调查所职员一览表					1932年元月
姓名	别号	年龄	籍贯	经历	到所年月
胡先骕	步曾	40	江西新建	美国哈佛大学博士	17年本所成立
秉志	农山	46	河南开封	美国康奈尔大学博士	17年本所成立
寿振黄	理初	33	浙江诸暨	美国斯坦福大学硕士	17年本所成立
张春霖	震东	35	河南开封	法国巴黎大学	20年7月
蔡希陶	玄彭	22	浙江东阳	光华大学肄业	19年8月
周汉藩	勺泉	45	湖南平江	湖南高等师范毕业	18年9月
冯澄如		31	江苏宜兴		17年秋
沈嘉瑞		29	浙江嘉兴		17年秋
陈封怀		33	江西修水	东南大学毕业	20年元月
唐进	英如	32	江苏吴县	农业大学	17年本所成立
汪发缙	奕英	33	安徽祁门	东南大学	18年3月
何琦	希韩	30	江苏义乌	燕京大学	18年9月
夏纬琨	玉峯	27	河北柏乡	中法大学肄业	18年10月
喻兆琦	慕韩	35	江苏东台	法国巴黎大学及巴黎博物院研究员	23年3月
顾东岳	勋秀	27	河北任丘	北京大学	
潘次农		26	安徽休宁	清华大学	22年8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南京），《静生生物调查所职员录及一览表》，全宗号：609，案卷号：004。

## 1932年秋 沈嘉瑞赴英留学

1932年秋，沈嘉瑞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奖学金，赴英国伦敦大学研究院专研甲壳类动物的平衡器官和蟹类的发生史及生长规律。在1934年底完成博士论文后，到英国各地海洋生物研究所和博物院及欧陆有关机关进行考察，1935年夏回国。但未重返静生生物调查所，而任教于北京大学。《科学新闻》，《科学》，16（7），1932年，中国科学社发行。

## 1932年 静生生物调查所研究工作进展

静生生物调查所动物部主任秉志继续研究“中国之螺类”及地质调查所葛拉普教授所赠的螺类与三门系螺类化石。技师寿振黄继续研究河北省及四川鸟类。技师张春霖研究四川、广东、福建等省鲤科鱼类，吉林、河南鱼类及中国爬行类。寿振黄、张春霖共同研究河北鲤科鱼类。研究员沈嘉瑞研究华北及香港蟹类。何琦研究北平蚊蝇类。闫敦建与秉志共同研究螺类及螺类化石，均有一定结果。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南京），《静生生物调查所1932年工作报告（1931.7—1932.6）》，全宗号：609，案卷号：007。

## 1932年 静生生物调查所动物部标本采集

据《静生生物调查所第四次年报》（1932年）报道：4月间由寿振黄、唐善康赴北平附近的沙城采集鸟类标本。5月至9月又赴西陵、涑水、塘沽、唐山、碑家店各处采

集标本和考察。张春霖在北平附近采集爬虫类、两栖类及鱼类。何琦在北平附近采集昆虫标本，得麻蝇约 3000 号。闫敦建于春季赴塘沽、大沽、北塘口等处采集螺类标本。7 月又前往湖南、福建、厦门等处采集，采集标本非常丰富。沈嘉瑞在夏、秋两季赴中国南部采集蟹类及鱼类标本。南开大学教授熊大仕赴江西采集昆虫、鱼类、两栖类。常麟春等经四川入大小凉山进入云南，后至昆明、建水、石屏等地采集鱼类、两栖类、爬虫类、鸟类、兽类标本。春季，唐瑞玉在福建上游挂整一带采集大量的鸟类、哺乳类、爬虫类、两栖类标本。同年，该所还组织了“云南生物采集团”，由该所最年轻的科研人员蔡希陶带领，进行了长达 20 年的采集活动，是我国近代生物史上历时最长的一次采集活动。

[1] 转引胡宗刚，《静生生物调查所史稿》，第 82 页，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2005，山东教育出版社。

[2] 《静生生物调查所概况》，《科学》，17（7），1127—1128 页，1933 年 7 月，中国科学社发行。

[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南京），《静生生物调查所 1932 年工作报告（1931.7—1932.6）》，全宗号：609，案卷号：007。

## 1932 年 静生生物调查所动物标本概况

1932 年，静生生物调查所获得其他机关或私人赠动物部的标本：有英国伦敦博物院所赠的甲壳类；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赠的甲壳类、爬虫类、两栖类、鸟类；美国国立博物馆赠的甲壳类；法国巴黎博物馆赠的鱼类；地质调查所赠的两栖类。私人赠送有：拉普先生赠的蚌类；赫克劳博士赠的节足动物；金叔初赠的珊瑚及熊新华赠的江西的鱼类等。经统计，当时静生生物调查所保存动物标本共计 11.5 万余号。其中：多孔类 90 号、腔肠类 1200 余号、棘皮类 3400 余号、蠕形类 900 余号、苔藓虫类 200 余号、软体动物 22 700 余号、甲壳类 22 100 余号、蜘蛛及多足类 600 余号、昆虫类 43 000 余号、鱼类 12 000 余号、两栖爬虫类 1000 余号、鸟类 6400 余号、哺乳类 300 余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南京），《静生生物调查所概况》，全宗号：609，案卷号：007。

## 1932 年 静生生物调查所论文发表概况

静生生物调查所动物部主任秉志与金叔初合著“香港软体动物报告”论文由香港自然杂志出版。寿振黄著“四川鸟类之调查”以及名誉研究员熊大仕著“羊瘤胃内之原生动物”与“中国牛瘤胃内之原生动物”2 篇论文，名誉研究员喻兆琦著“中国北部之虾形歪尾类”论文，喻兆琦与伍献文合著“中国比目鱼上之寄生桡足类”论文均由该所出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南京），《静生生物调查所 1932 年工作报告（1931.7—1932.6）》，全宗号：609，案卷号：007。

## 1932 年 沈嘉瑞编著《华北蟹类志》出版

1932 年沈嘉瑞出版《华北蟹类志》，该书叙述华北蟹类 60 余种，其中有不少新种。该书是我国动物学的首部专著，由静生生物调查所自行印刷发行。郭鄂、钱燕文、马建章等，《中国动物学发展史》，第 15 页，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

# 1933 年

## 1 月 17 日 静生生物调查所委员会召开第 11、12 次会议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我国东北三省已陷入日寇铁蹄之下，并威胁华北，在此严峻形势下，1933 年 1 月 17 日，静生生物调查所委员会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议务所召开了第 11 次会议，会议主要议题是：是否转移静生生物调查所的所址。会议主席任鸿隽首先报告，称：“刻下时局紧张，各学术团体均有相当准备，多将贵重物品集中，如遇必要，即可移至安全地点保存。但均认为迁移办公处所尚无必要，本调查所应取如何政策，请合众讨论”。丁文江谓：“本所为私立机关，危险性当属必更小，但不妨将贵重物品装箱保存，以备万一”。胡先骕也认为“华北情势终难乐观”，并提出在庐山设分所的建议。王文豹则认为迁所未至其时，并云：“本所系纪念范静生先生，先生常主张拨火当前，吾人研究学术之精神不可稍存退避，至于分所事不妨先行筹划”。翁文灏也同意在经费许可的范围内设立分所。

12 月 22 日，召开了第 12 次会议，会议议题是：会员会换届改选。会议议决：委员长：任鸿隽；书记：丁文江，会计：王文豹，执行委员：周诒春、金绍荃<sup>[1,2]</sup>。

[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南京），《静生生物调查所委员会记录》，全宗号：609，案卷号：003。

[2] 转引胡宗刚《静生生物调查所史稿》，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2005，山东教育出版社。

## 6 月 9 日 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赴云南采集标本

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组织云南采集团，职员常麟定、蒋英、唐瑞金、林应时，技工陈绍清共 5 人，出发前往云南采集动植物标本。1934 年 5 月中旬采集结束，6 月返京，共采集动物标本 4400 余种，植物标本 1000 余种。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工作报告》，全宗号：393，案卷号：66。

## 6 月 张春霖发表“鲤科鳞片之研究”

静生生物调查所张春霖在《科学》上发表“鲤科鳞片之研究”，论文阐述了鲤科鱼类鳞片的构造为分类特性之一。该篇论文是张春霖在长江流域采集百余种鲤科标本的基础上撰写的。《科学》17（6），940—947，1933 年 6 月，中国科学社编辑。

## 1933 年 静生生物调查所标本采集

据《静生生物调查所第五次年报》（1933 年）报道，1933 年静生生物调查所唐善康在夏秋两季赴河北省西部及南部进行采集，共得脊椎动物标本 800 余号；张春霖在北平附近采集鱼类、两栖类标本；5—7 月，何琦先后赴浙江、青岛、济南进行采集，并获得较多昆虫标本。阎敦建 5 月中旬出发至浙江镇海、宁波、定海、普陀、象山、南田、玉环、温州、瑞安、平阳、金乡、炎亭以及与福建交界之镇下关等处采集软体动物标本，后转赴香港、澳门和广东江门、阳江、水东以及广州湾（今湛江）等处采集，10 月返所，采集标本也很多。转引胡宗刚，《静生生物调查所史稿》，第 83 页，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2005，山东教育出版社。

# 1934 年

## 1 月 17 日 秉志发起组织“海南生物采集团”

海南生物采集团由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秉志发起，并联合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山东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6 所生物研究机构和大学合组而成。该次考察采集是新中国成立前规模最大、参加单位最多的生物采集活动。在制定详细考察、采集计划后，出发南下进行生物采集，足迹踏遍全岛，1935 年 10 月采集结束。

采集团由秉志总负责，分海陆两队同时采集，王以康、伍献文负责海队，带领 8 名队员在沿海地带以采集海产生物为主；左景烈、何琦负责陆队，带领 6 名队员深入黎族、苗族人境内，以采集陆产生物为主。此次采集，两队共采获昆虫 1.5 万号；棘皮动物、环节动物、贝类、节肢动物、海绵、珊瑚等无脊椎动物 1 万余号；鱼类、两栖类、爬虫类等脊椎动物 5000 号。菌类及植物标本 4000 余号<sup>[1-3]</sup>。

[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南京），《海南生物采集团》，全宗号：393，案卷号：251。

[2] 海南生物科学采集团，《科学》，18（2），284 页，1934 年 2 月，中国科学社发行。

[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工作报告（1935 年 11 月）》，全宗号：393，案卷号：66。

## 1 月 29 日—2 月 8 日 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举办生物展览会

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举办生物展览会。展出的内容包括 4 个方面：1) 寄生动物标本室：从寄生在人体内的原生动物起，到节肢动物，共展出标本 47 种，64 瓶；2) 动物分类陈列室：展出哺乳类、爬虫类、两栖类、鱼类、无脊椎动物等标本；3) 植物标本陈列室；4) 中学动物教材陈列室。前来参观的人员达 1 万余人。《科学》，18（4），550 页，1934 年 4 月，中国科学社发行。

## 7 月 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改组与职员聘任

1930 年 1 月 30 日成立的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改组成为动植物研究所。院长蔡元培聘任王家楫为专任研究员兼动植物研究所所长。所长王家楫聘任邓叔群、伍献文、陈世骧、方炳文为专任研究员；聘任裴鉴、耿以礼为兼任研究员；聘任常麟定、唐世凤为助理研究员。聘任：邓祥坤、唐瑞金为采集员；杨志逸、徐叔容为绘图员；杨培纶为庶务；刘勋卓为书记；杨存德为事务员。聘任钱天鹤、秉志、钱崇澍、李四光、李济、胡先骕、徐韦曼为顾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南京），《动植物研究所聘任卷二宗》，全宗号：393，案卷号：499。

## 8 月 23 日 中国动物学会成立

中国动物学会在江西庐山莲花谷宣告成立。该会由秉志、辛树帜、胡经甫、陈桢、刘崇乐、张春霖、寿振黄、郑作新、伍献文、朱洗、喻兆琦、王家楫等动物学家 30 人共同发起。会议通过了学会章程，选举产生首届理事：伍献文、辛树帜、王家楫、经利彬、武兆发、孙宗彭。推选秉志为中国动物学会首届会长，胡经甫为副会长。会址暂设

在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内。

8月24日，召开了第一次理事会议，会议决定创办《中国动物学杂志》(*The Chinese Journal of Zoology*)，并推举了编辑部总编辑和编委人选。

《科学》，18(7)，1002页，1934年7月，中国科学社发行。

## 10月 北平研究院动物学研究所新建生物楼竣工

北平研究院动物学研究所在广善寺北侧新建的生物楼(即陆谟克堂)竣工，研究室一部迁入该楼工作。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南京)，《国立北平研究院概况(1929.9—1948.8)》，全宗号：393，案卷号：001。

## 10月 杨惟义到静生生物调查所工作

杨惟义到静生生物调查所工作，曾任动物部技师兼秘书。杨惟义早年从事昆虫学研究，曾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资助，赴法、英、德等国博物馆专门研究半翅目昆虫的分类，曾任江西省昆虫局局长。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南京)，《静生生物调查所职员录及一览表——静生生物调查所概况》，全宗号：609，案卷号：004。

## 1934年 静生生物调查所动物部标本采集

据《静生生物调查所第六次年报》(1934年)报道，1934年静生生物调查所动物部何琦等4人参加了海南生物采集团，何琦负责陆队，带领6名队员，在黎族境内进行动物标本采集。途径彦圣、同甲、毛尚岭、保亭、白魄、新村港、沙漠崛等地，11月中，率队北返，携回大批兽皮、鸟皮、爬虫类、软体动物、环形动物、寄生虫标本、甲壳类、蜘蛛、百足等标本。7—8月，张春霖赴青岛进行沿海鱼类的标本采集，共采集标本千余号。顾东岳在北平附近采得软体动物标本千余号。赵安祥、常麟春、洪绍山又赴涑源进行鱼类、鸟类、哺乳类、蚌类标本的采集<sup>[1-3]</sup>。

[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南京)，《静生生物调查所(第6次年报)1934年年报》。

[2] 转引胡宗刚，《静生生物调查所史稿》，第82页，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2005，山东教育出版社。

[3] 《科学》，18(4)，550页，1934年4月，中国科学社发行。

## 1934年 陈世骧博士论文获法国昆虫学会1934年巴赛奖金

1934年陈世骧以“中国和越南北部叶甲亚科的系统研究”论文通过答辩，并获法国巴黎大学博士学位，这是我国研究该类群的第一篇论文。该篇论文获法国昆虫学会1934年巴赛奖金(Prix Passet)。动物研究所人事档案。

## 1934年 陈桢发表“金鱼蓝色和棕色的遗传”论文

1934年陈桢发表“金鱼蓝色和棕色的遗传”(The Inheritance of Blue and Brown Colours in the Goldfish, *Carassius auratus* Jour.)，证明金鱼体色的蓝色决定于一对纯合隐性基因，棕色则决定于四对独立的纯合隐性基因。用蓝色鱼和棕色鱼杂交，他获得了一个新的、不分离的蓝棕色金鱼品种。这样，他为金鱼的遗传育种开辟了一个杂交和选择的新途径，并成为我国动物遗传学的主要创始人。日本鱼类遗传学家松井佳一称他